

田永元自选集

散文卷

田永元 /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田永元自选集

散文卷

田永元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永元自选集·散文卷/田永元著.—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113-20768-7

I. ①田… II. ①田…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2734 号

书 名: 田永元自选集·散文卷
作 者: 田永元 著

策 划: 石建英
责任编辑: 石建英 编辑部电话: 010-63549510
封面设计: 崔 欣
责任校对: 焦桂荣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8.25(总 81) 字数: 340 千(总 1 500 千)
书 号: ISBN 978-7-113-20768-7
定 价: 18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010)51873659,路电(021)73659,传真(010)63549480

目 录

共和国的列车上有我一支歌	1
感谢京剧	6
1965年的除夕夜	9
走入我心灵深处的北戴河	11
小镇“观礼台”	14
满地花黄忆大姐	16
从不曾淡漠的记忆	18
他开拓和生活在永恒的文学天地里	24
大美不言流诗韵	30
浪花里淘洗的诗句	32
李世俊的艺术世界	34
书法艺术是一首抒情诗	37
列车真朋友	40
踩着人生奋进的鼓点	45
段长师傅,我为你而感到骄傲	48
谁持彩练当空舞	52
映日荷花别样红	55
开掘和展现	57
应对的艺术和信心的凝聚	59
美丽的瞬间和永世的追求	61
哦,山里红	63
令人心动的时节	65
由穿名牌想到的	67
正值秋高气爽时	69
胸中波涌情自流	71
梳理的艺术	74

好雨知时节	76
万类霜天竞自由	77
信念的最好表达方式	79
清新应该成为文学作品的一种风格	81
遥祝大雪纷飞的南方	82
行动是对春天的承诺	84
我喜欢暖洋洋的冬日阳光	86
有一种感动是心灵的钥匙	87
从品茶中品出从容不迫的欢愉	89
深入基层,真情投入	91
宁静遐思	93
六十而立	95
学会珍惜	97
学会舍弃	98
字情,诗情,人情	99
京剧的魅力	102
关注中篇小说创作	104
大东区,一个张扬文化魅力的地方	106
正当果实结满了天涯	108
对酒当歌,时代当歌	110
大地的从容	112
嫁接、引进与模仿秀	114
这一年,我们咀嚼着岁月的橄榄	116
初秋,一个万物走向成熟的时节	118
映日荷花别样红	120
我对春天的诉说	122
真诚的告白	124
大姐,你在哪里	125
爸爸与京剧	127
诗歌天地的风采	129
妙香山的姑娘	131

沿着人生的小径拾级而上	133
情在云水间	136
幸福,是因为有一种感受	139
没有收获的喜悦	141
永远的爸爸	143
倾注着生命和激情的忘我追求	150
湖光岩、大川和我	156
天道酬勤,事业当歌	161
在文学的起跑线上	163
在跨世纪的呼唤中	165
中国铁路旅游第一人	172
春潮般情怀	190
宝在山中有人识	201
我所敬重的一位长者	206
被扭曲的爱	210
为深化铁路改革鼓与呼	220
山水的诱惑和诗人的感觉	222
在生活的底蕴中开掘	224
生活的感悟与诗的成熟	226
山村的守望	229
生活,刚刚开始	231
咿呀孙女 16 月	234
那些为水而奋斗过的前辈	236
流淌在心中的激情	266
我的前辈主编	270
寻觅在男子汉的王国里	273
蜡炬成灰泪始干	276
后记	285

共和国的列车上有我一支歌

——献给我的同时代人

共和国已走过了 47 个年头，而我同共和国一样，也经历了 47 年的风风雨雨，真的步入了人生的中年了。可是我的心头，仍是那样充满着“三分稚气，七分热情”，从来都没有感到过已是“不惑之年”。这正如共和国在经历了多次的不幸后，在今天才看到了她更加蓬勃的面貌一样。像我们这样和共和国同龄的人，同祖国共命运的感觉是何等强烈啊！

我的成长同共和国许多运动、许多事件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你不能不承认，这里面包含着个人的悲喜，包含着个人的感慨。童年是一瞬间的事，随之欢乐也悄悄地隐遁了。父亲被冤枉地投进监狱，使我在幼小的心灵中，承受了那个年龄段难以承受的打击；使我更早地尝到了人间的冷暖。而应该对共和国承担的责任，这样一个令人万分激动的主题，也更早地，那样令人感动地缠绕于我的思想。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为自己的家庭效力，为共和国效力，是那样根深蒂固地盘踞于我的脑海；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正统”思想，使我有目的地选择了作家这样一种至今在我的思想里仍旧是如此神圣的职业，而且，坎坎坷坷地走过了 20 余年。

为了圆这个作家梦，我尝到人间的酸甜苦辣，也可以说更多的是苦辣吧。也许是我自幼爱幻想的缘故，也许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我面临人生职业选择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铁路，而且是火车司机这注定要吃尽千辛万苦的行当。1969 年 5 月 9 日，那是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对于北方人在经历了又一个寒冬后，会带来怎样的喜悦，走出室外去迎接这样的好时节啊！可是我却是迈着极其沉重的脚步，背着极沉重的行李，独身一人，来到了当时隶属于锦州铁路局的大虎山机务段当了一名给煤工。说来令人寒心，在那个荒蛮的年月，一名铁路技校毕业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于再教育的厄运，每天除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外，还有无休止的政治学习，无休止的大批判，头脑的弦总是绷得紧紧的，还谈得上什么青春，谈得上什么欢乐。然而，毕竟是青春的年华，掩不住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渴望，使我躁动于心头的激情常常没有宣泄的地方，于是尽管在当时明知道写文章，尤其是那一类抒发感情的文章会招致许多的不测，我还是忍不住拿起了笔，写起了四不像的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来，以往人们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不无道理。唐朝的塞外诗人之所以写了那

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来,同他们所处在的大漠风沙的奇特环境是分不开的,正是大漠的风沙砥砺了诗人的意志和激情,才使他们有感而发。我也许受到这些诗篇的影响更深些,因此,当在辽宁的西北部抡起我的铁锹,在空旷的铁路线上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着三九严寒那凛冽的风雪袭击的时候,一种愤懑,一种说不出来的悲怆,同一种劳动过后所独有的自豪,还有那个年代也是独有的个人盲目崇拜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便以铁路,更以火车头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激情竟一发而不可收。我至今仍不会忘记那个年月严酷的生活所给予我的馈赠:那就是磨炼了我的韧性和刚劲!尽管生活是如此令人沮丧,我在机务段里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一些当权者们的冷落和刁难。然而,我从没有敢荒废自己的一点光阴,那个年月里我从一位朋友的手里通过许多周折,搞到了陈毅的几首诗词,真是如获至宝。其中那几句“此日练得好身手,它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灰。”读得我热泪盈眶,仿佛在那个令人心灰意冷的年月里,陈老总单独面对面教诲我说的。我郑重地将这几句话抄在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并以此来激励着自己。正是有了这种激励,每逢夜晚我在煤台上上班,总是用一个包红宝书的塑料皮,夹着一本从好友手里借来的在当时还不让看的禁书,或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或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或是当代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万籁俱寂之时,那些煤台的工人早已进入梦乡或是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便靠在那张油渍渍的桌子旁,有滋有味儿地读起这些不朽的作品来,这些作品给我的思想开辟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使我感到无比充实。也只有在此时,我才会排遣掉心头许多的忧愁和不快,坚定着自己“此日练得好身手”的信念!

在这些文学作品不断地熏陶下,我创作的水平和文字的修养在那个年月也有所提高。林彪垮台后,敏感的人们已经觉察到文学开始露出了一点光亮。1972年末,辽宁有了第一个刊物《辽宁文艺》。这在万马齐喑的年月,对我们这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有志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几经辗转,我终于打听到编辑部的所在地。还记得是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利用跑车到沈阳间休的机会,穿着来不及脱下的一身油包,费尽了许多的口舌,终于在原来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个编辑部。正是这一天,使我认识了许多过去在报刊上知名的编辑和作家,我的第一组诗《火车头之歌》就是这样经过了当时张书绅编辑的帮助,得以在1973年第三期的《辽宁文艺》上发表。在那个大喊大叫空话连篇的年月,也许我的诗有一点生活的气息和真诚的情感吧,这组诗的发表立刻受到了辽宁文艺界的关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步入文坛的最初年月里,辽宁的作家张书绅、晓凡、田思基等,他们或是我的兄长,或是我的前辈,对我这位工人作者给予的精神上的安慰和事业上的鼓舞,在那个年月里起到了任何人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我在那个荒蛮的年月里,明知道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荆棘重重,然而,我却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着文学,追求着自己的目标。自然,诉说不尽的悲哀,也正是由于我爱上了文学而开始。作品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刚刚解放,

甚至还没有解放的老作家都向我投注了关切的目光，经过了种种的交涉，才同意田永元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向刊物投稿。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在当年就是这般神圣地存在着的。而单位里的个别人认为：你对写抒发个个感情的文学作品兴趣这般浓，为什么不多写些大批判稿呢？这本身说明思想就不健康。于是，尽管写诗写散文，没人说是不对的，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时不痛切地感到思想上的压力。歇班回来，常常是将门掩上，偷偷地写，等有人敲门，立刻将稿子藏在行李中。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不可思议，那时既没有稿费，也没有什么福利待遇，可是为什么还那样执著地追求文学创作？我只能含着热泪说：我被那时的政治压抑得太久，太苦了，唯有在稿纸上才能创造出我心中的一片天地；唯有将对生活的苦恋倾注在稿纸上，才能在扭曲中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就是这一组组反映铁路人生活和情感的诗从我的心头渗着汗水，有时是渗着血水流了出来，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诗还掺和着政治的概念和空洞的口号，然而，在那嘶哑的吟唱中，毕竟有我心中对那个时代所倾注的感情和希望啊！在那个令人战栗的时代，我毕竟没有沉默，我毕竟没有自甘暴弃，而是用自己的身心，用自己的声音，为那个年代，在铁路那伸延着自己理想和追求的天地里，留下了自己淡淡的一瞥。诗人也好，作家也罢，困难和艰难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可低估的财富，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始终能保持比较旺盛的工作热情。对于处于生活底蕴中的人们充满着挚深的情谊，这肯定与我的那段不平常的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正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我的创作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社会上的进一步关注。多次参加了由铁道部和各级作协主办的许多笔会和重大题材的创作会，使我无论从思想上和创作技巧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我两次被送到辽宁义学院深造，使我受益匪浅。从理论上认识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带有根本性的缺陷，为我今后在文学创作中应该努力提高的方面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正是有了理论上的提高，才使我在这一时期里的创作如鱼得水，而越发旺盛起来。为了写一本反映全国火车司机生活的书，我辗转于全国各个机务段，在火车头上，在职工宿舍里，同那些机车乘务员们朝夕相处，一同担负乘务任务，一同话家常，甚至同他们一起焦虑着中国铁路的种种隐患。记得那是在长白山麓的铁路区段吧，我跃上车头，在蒸汽机车的烟熏火燎中，我挥动铁锹，为闯坡的机车拼命地添着煤，火车发出艰涩而又沉闷的声响，汗水顺着脸颊流进我的脖颈，摔向地板，而此时司机的两眼圆睁，恨不能身上也套上一根绳子，拉着列车闯过坡道，一种昔日曾有过的感受又重新回到我的周身，我想到那些艰难的日子，每天不就是这样拼尽全身的力气，为了一个目标，不停地闯着，闯着吗？立刻，我的思绪激荡，竟不能自抑，人将到中年，在这样一种生活的氛围里，面对着这些昔日的“穷哥儿们”，你没有任何资格停歇自己前进的脚步，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们而去追赶文坛中的时髦……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火车司机，认识他们创造的劳动价

值。正是怀有这样的强烈责任感,我日夜不停地写,满怀激情地写,有时甚至是流着热泪地写;当1988年出版了我的长篇报告文学《神仙王国里的酸甜苦辣》的时候,我深深地尝到了一个作家与他所热爱着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滋味儿。这本描写火车司机的生活、工作和喜怒哀乐的作品一出版,就在全国铁路尤其是机务部门产生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我一下子收到了几百封路内外读者的来信,那信有的不能不让你动情,让你流泪,而中心的意思只有一个:谢谢我们的作家,你使我们认识了火车司机这样一个令人感动的生活领域……在这段难忘的时光里,因为这本书,我内心里郁结着被人中伤的块垒,一时间能对谁言?而此时,正值新年到来之际,谁曾想,一封封向我祝贺新年的信件和电报从各机务段纷至沓来,正是从这些真诚而洋溢着友谊的信件里我感受到了作家真正存在的价值,而此时沈阳铁路局和铁道部领导更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我在创作的道路上勇气倍增,对人生的认识又更深一层。1990年秋当我去武汉铁路分局采访的时候,我被分局的宣传部长拽到了江汉机务段,当年这个闻名于全国的“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的众多工人们团团将我围住了,他们以真诚和热烈表达了对这本书的喜爱、表达着对我的深情。那情,那景,令我热泪盈眶。我是一个从烟熏火燎中走出来的人,也许命运决定着我,终生应该毫不迟疑地为这些为共和国付诸了更多汗水的劳动者们歌唱、呐喊,这已经不是个什么感情的问题了,而是应该属于我事业和生命的一部分的了!正是满怀着这样的情感,20多年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无论在多么艰若的环境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我都没有忘记自己是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而成长起来的铁路作家,都没有忘记怎样以满腔的激情去反映我们这个越来越多彩多姿的时代;而共和国所给予我的越来越多的厚爱,又常常激励着我多为这个社会奉献一点力量!这20多年来我出版了四部诗集,五本报告文学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电视剧,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铁路反映铁路员工生活,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先后获得了十几次省、部级以上的文学奖励,连续获得了五届全路文学创作奖。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感受到共和国的艰难和荣誉也许是太多的缘故吧,责任感总是那样时时缠绕着我们的情怀;因此,共和国的每一个进步都使我们欢呼跳跃,而每一次失误都会令我们忧心忡忡。我们注定是要做着承前启后的事事,我们不可能跳出这个思维的定势,在创作上因此也会受着这样一种定势的左右,而且总是心甘情愿的,问题是怎样能更好地挖掘这里面的东西,怎样更多地去掉那种浮躁,更多地去掉那些浅薄,这的确是摆在我自己面前的当务之急。否则,随着年岁的增加,就有可能将这种定势变成一种惰性,一种紧箍,那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很快被历史所淘汰!当共和国迎来第47年生日的时候,当我也为自己不断地走向成熟而“半是喜悦,半是惶恐”的时候,紧迫感就是这样又一次向我袭来,责任感又是这样向我袭来。我不改初衷地仍是那句话:我还是我,我是一名真正的铁路作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积极地投身于铁路建设的改革大潮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以不辜负党和人民及这个时代对我的厚爱！

愿共和国更加昌盛繁荣！愿共和国的列车上，永远有我一支激情之歌！

1994年国庆节前写于深圳

1996年国庆节改于沈阳家中

感谢京剧

毫无讳言，在所有的文艺剧目中，我最喜欢的是京剧。

京剧不仅唱腔优美动人，而且每一出唱段文字都是极优美的诗篇。1961年，正是忍饥挨饿的年月，我来到家在哈尔滨的叔叔家里。叔叔是个地道的京剧“票友”，尽管那年月饿得难受，可是京剧的娱乐却必不可少。那时叔叔和一群“票友”正在热恋着那出《锁麟囊》，那优美而凄婉的唱腔深深地震撼了我小小的心灵，我央着叔叔一定要教我唱这段戏。要学唱必须有本子，可是那年月，有什么本子呀，叔叔拗不过我，竟然从一位同事那里借了剧本，利用午间休息的时光，用两张报废的描图纸背面，工工整整地将《锁麟囊》中《风雨亭》整段的唱词全给我抄下来了。自然，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不可能学会那样艰难的唱腔儿，然而，没用几天的工夫我却将“风雨亭”的唱段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京剧的唱词，我仿佛突然间发现，京剧的每段唱词都是一首情感真挚的诗歌。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化泪寂寥……这些优美而又动人的句子，把我的思绪带到一个悠远的社会，带到一片情感的世界之中，同时在我的思想里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后的日子，使我更加喜爱京剧，虽然，不太会唱，却背诵了许多京剧中的好唱段。

那时候，我简直对京剧着迷了，天天缠着母亲要去当京剧演员。为了学京剧里的工夫，我凭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找一群小朋友，竟然学着京剧里的武打动作，蛮练起来，有时难免搞得头破血流。可是，正是这样的磨炼，砥砺了我的毅力，小时候，翻那种“土跟头”一口气竟然能翻它十几个。记得那年市里的业余体校招收新学员，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件大事。可是回到家里一说，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时候正值“低标准”期间，连饭都吃不饱，家长怎么会同意再上体校蹦蹦跳跳的；后来，我用不吃饭表示抗议，母亲终于默许了。可当我再去报名时，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报名期已经结束了。我不甘心，约了几位有兴趣的小伙伴儿，在体育馆里找到了那位教练。因为名额满了，他很为难，可是当我说要报体操队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有这方面的特长吗？”我们一时语塞了，还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说了句：“他会翻跟头。”这下教练来了劲儿问我：“你敢在硬地上翻吗？”我说：“怎么不敢。”于是在雨中，在体育馆门前的硬地面上，我连翻了几个跟头，他高兴地点点头，就这样我被市里的体操队录取了。

正是喜欢了京剧，我的思路大开，而对那些剧本的熟悉，那些京剧词句的背诵，竟越发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同时我也越发地感觉到做一名真正的京剧演员的殊荣。记得那年“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来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演出。荀慧生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兴奋起来，父亲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买到了他所主演的《红娘》戏票，我也有幸亲眼目睹和聆听了这位大师的演唱。那时我还不懂得品味戏中的精华，然而从大人们那一次又一次的掌声里，我感受了他的不同寻常的表演和人们对他的由衷喜欢。令我更难忘的是最后的谢幕，所谓的三谢幕，那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我总觉得同今天看到的那些所谓新潮歌星在台上所受到的欢迎情景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演出完后，荀慧生给大家行礼，台下的人不肯走，持续了一段时间，荀慧生回到后台将妆卸了，台下又是一阵鼓掌，而且比上一次更热烈些。见观众还是不肯散去，无奈，荀慧生回到后台，将脸上的油彩都洗去了，显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观众这才方肯罢休。后来爸爸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是很幸福了。想当年梅兰芳到哈尔滨演出，我同你的姑父和一位朋友，三个人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结果是，两个人在外面等着，一个人进里边看，看一会儿再出来换下一个看，一场戏，三个人轮换着才算看完了，看到梅兰芳演的戏，那个满足劲儿，今天还令人回味……”这就是京剧魅力。

记得60年代中期，我随父亲来到抚顺。当时，全家人挤在一间房里，虽然拥挤但房子明亮，好多人家愿意用两间来换，最终父亲选择了两小间又潮又暗的住房，不为别的，就因为它是京剧团的宿舍。在那些日子里虽然日子过得挺苦，可是早晨一睁开眼就被那一声声吊嗓的声音所激动，还有的干脆直接就唱上二句：“窦儿墩，在朝中谁不敬仰……”这里简直就是个空旷的大排练场，每逢这时爸爸都会坐在家里不住地点头说：“这位是好名角嘞，咳，这小子前程无量……”而正是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我帮助爸爸推带车子，空旷的田野里，也不时吊起嗓子唱上两句以抒发心头的郁闷心情。那些或悲怆，或深沉，或明快的唱腔，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曲牌，都是那样铭心刻骨地渗透在我的思想里。也许正是那个时候，使我胸中不时有了要抒发情感的冲动，有了创作的欲望。而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夜晚，为爸爸用一根劈开的筷子夹上一块松香点燃，将燃化的松香滴在琴码上。为了不出太大的声音，爸爸常常将胡琴夹在大腿上，很动情地拉着。什么小过门，西皮流水，还有那动人的《夜深沉》曲牌，这些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的曲调，曾那样令我动情，那样扣动着我的心弦。它让我感受着一片开阔的艺术天地，它纯净着我的心灵，它让我看到在这个世界里，还有我们所永远值得追求的境界。也正是有着这样的信念，在那蛮荒的年月里，我将大部分业余时间，陶醉在样板戏中，从那里领略着博大精深的京剧，那变幻莫测的艺术真谛。

那时候，我在一个小镇的机务段里当机车乘务员，整天喧嚣的政治欺骗，枯燥的业余生活同我们不可抑制的涌动在心头的青春激情，真的是水火不能相容，然

而,我们毕竟需要抒发,需要宣泄,正是那几个样板戏,使我们找到了某种表现自我的境遇。当年为了表现自我,我们同当时的地区文艺队的演员摽着劲儿。他们在台上唱,我们休班在屋里唱。那时为了唱杨子荣的《胸有朝阳》和李玉和的大段唱腔,玩命地练,直到宿舍里的人甚至段里的工人们都叫好,承认我们唱得绝对比地区演出队唱得更好为止。那种宣泄,那种心理上的满足,在那个年月是何等的重要啊!

京剧不仅让我感受人生的尊严,京剧还让我排除许多人生的烦恼。记得1992年夏天,我因不慎在去母亲家的途中将3万多元丢失,那一瞬间真的六神无主,要知道那个时候,3万多元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意味着什么。那天下着大雨,女儿见此情景忍不住哭了,我一边劝慰着女儿,一边安抚着自己的心情,那种心态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当走进青年公园处,大雨不得不让我们躲到亭里避雨。此时,一群“票友”唱兴正酣,那种置身于艺术享受之中而忘乎所以的神情,令人好感动!我不由一腔热血涌动,大有慷慨悲壮之悟地告诉女儿:“哭什么,丢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能免大灾哩。”那天,我突然地加盟到这群“票友”之间,几句唱腔拖出,一片叫好之声。外面大雨滂沱,亭子里却是一片激情的人群,我真的被感动了,也真的是“有感”而发了,那声音划破雨中的沉闷,只觉一股豪气在云间激荡。在一片叫好声里,竟然一口气唱了三大段,唱得热血沸腾,最后拱手道别,一脸得意,丢失了3万多元的沮丧,早飞得无影无踪了。回到父母身旁,老人埋怨我为什么迟到,我的女儿爽快回答:“爸爸今天露了一手,让人捧着一连唱了三段。”老父亲登时来了精神:“再好好练练,行!”我心里想:多亏京剧,化解了我心中块垒。否则我不知道因为丢失了这3万多元要窝囊到什么时候呢。

如今,也许是年龄的关系,我对京剧更是情有独钟,每天看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自然习惯地调到11频道,渐渐地耳濡目染,妻子和女儿也对京剧有所了解。那种京剧的锣鼓一响,其乐融融的场面,真的让人感受到一种家庭所独有的幸福氛围。唱起京剧真的可以让人精神饱满,能摒弃了人生多少烦恼;倾听京剧真的可以陶冶人的性情,给人以怎样的生活信念和激情啊!

我真的应该感谢京剧,京剧令我受益匪浅。

(原载《沈阳铁道报》2004年3月29日)

1965 年的除夕夜

那一年我 16 岁，和大我一岁的三哥，同在抚顺三中读初三。这一年，我们家住在市内“欢乐园”附近的一座被称为北红楼的地方。

这里原来是京剧院的宿舍，后来，唱戏的名角陆续都走了，剩下的恐怕是身份更低些的居民。而我们家的入住意味着这个大院有了更贫困的底线。在这个有着近百户人家的大杂院里，由于房屋年久失修，那种破烂的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每逢寒冬，院子里堆满了积雪，让本来没有暖气设备的楼房，更显得寒气逼人缺少生机。

记得那是临近傍晚的时候，街面上依稀有了零星的爆竹声，这时候，我们才似乎真正意识到：又一个大年逼近了。俗话说：穷人是不盼年的。我们这个八口之家，靠父亲推带车维系一家人的生活，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父亲有着严重的支气管炎，在三九严冬；基本上是出不了车的。这时，常常是我同三哥轮流着担负起推车的任务。

这不，除夕夜临近了，我们还没包饺子哩。我心里明白，家里就买了那么几斤肉，没有多大意思。正在此时，街道里的居民组组长袁头颤巍巍地敲开了我们家的门，对我妈说，这大过年的院子里的雪还四周堆着哩，咱得有点过年的意思，我寻思着，你家的几个半大小子呆着也是呆，家里还有现成的带车子，还不如让孩子活动活动腿儿，将这些雪都推到浑河边上去，我让每家出个一角八分的，也算是过年的报酬了。没等妈妈表态，我同三哥从炕上一下蹦了起来：行，干完就给钱吗？老袁头微微一笑：那还掺假呀！那我们这就干！我和三哥齐声答道。

好哇，完事儿就给五元钱！就这么说定了。说着他也不管我妈妈点不点头，转身就走了。我的浑身涌动着热血：五元钱，那是什么概念，是可以买六七斤猪肉的概念！是可以交一学期学杂费的概念。

走出屋子，再细端详眼前的积雪，就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是近半个冬天积攒的雪呀，那雪堆得到处都是，我估摸着怎么也得推出几十车来，再说还得推到浑河边，来回一趟足有几里路呀。我同三哥交换了一个眼神儿，立刻将带车支巴起来，挥起锹镐，说干就干起来。

干这样的活儿，担当主力的自然是我和三哥；大哥成家在外，二哥的腿有毛病只能帮助装车，几个妹妹尚小，这样的活儿，从来不惊动她们。

那时候的冬天似乎比今天更寒冷些，多日的积雪，有的冻得挺实，还要用镐头刨。不大工夫，我们就干得热火朝天，为了减少来回的次数，每车雪都装得像小山一样，每次妈妈出来看我们装车，都心疼地唠叨几句，悠着点呀，可别太累着呀！

不会的！我同三哥心里都明白：再悠着点儿，不使劲儿，不撒欢儿，一夜能干完吗？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懂事开始，我们就觉得：父母的担子太沉重了，我们该承担一些了。每逢想到这些心头总会升腾出一股挺自豪的情感，能够帮着父母减轻一点生活的负担，吃点苦算什么？就这样我同三哥装满后，前拉后推，忙碌得不亦乐乎。而此时，鞭炮声已在院子里响了起来，左邻右舍的看到我们还在扫雪，赞叹之声不绝于耳，这无形之中又给了我们不少的鼓舞。

人的体力毕竟是有限的。来回跑了一阵子，我们的脚步自然放慢下来，开始感觉到有点儿飘轻，正是这样的一个不经意，车轮不小心陷入了雪坑里，一个轱辘说什么也拽不出来了，这让我们十分懊恼，此时已临近半夜，看来想干利索，在家过除夕的愿望要破灭了。我同三哥索性脱下棉衣，拿出了一股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气魄来：三哥用手不停地抠着陷入雪坑里的一只车轱辘，我则狠劲儿地往外抬着。这样往复多次，汗水不停地从我的头上往下滴，好艰难哪。正在这时，只见两个妹妹呼喊着走近了我们，原来妈妈看我们这趟车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不放心，打发两个妹妹来找我们了。在寒天雪地里相见，仿佛是两支突围的部队，终于胜利会师似的，真的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激动；两个妹妹虽然年岁不大，却十分吃得苦，见到眼下的我们，也不说什么，都伸出手来抠着车轮下的积雪，终于，带车从雪坑中被拽了出来。我们兄妹四人相互推搡着，放声地大笑起来……

路上的鞭炮声越来越稠密了，我们的耳畔却是兄妹间欢畅的笑声。当我们把整个大院的积雪彻底清扫干净的时候，老袁头出现在我们家门前，他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五元钱。冲着我的爸爸妈妈连声地夸奖着：你们这几个孩子好样的呀。

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当她接过那五元钱的时候突然转过脸去，我看见两滴泪珠一下子滚落在那崭新的五元票上了。

屋子里一阵沉默，这时我似乎才真正感到，外面辞旧迎新的鞭炮好响呀！

（原载《沈阳日报》2010年2月22日）

走入我心灵深处的北戴河

泛着亮晶晶的波纹的大海，同岸边嬉戏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是仲夏北戴河海滨让人怦然心动的一幕。

当我置身于这海天之间时，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2年前。冷不丁就觉得，原来我同这美丽的海滨，真的有着难言的因缘。北戴河是帮我立身、给我幸运的宝地呀！

那是1967年的仲夏。抚顺的家乡正值武斗，正在锦州铁路司机学校念技校的我和几个家在抚顺的同学没有事情可做，突然就想到了北戴河。也许是经过了“文革”那种激烈的躁动后，我们太需要一种宁静的环境了，去北戴河的提议使我同几位同学当晚就迫不及待地启程，要知道我们都是火车司机学校的学生呀，坐不花钱的火车，比起一般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

清晨在北戴河站下车时，北戴河的真实面貌令我们有几分困惑。经受了“文革”的磨难，北戴河一片凄冷，然而，从政治漩涡里爬出来的我们，一来到海滨，仍感到分明是进入了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在那大海的怀抱中，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和感悟。对于我这个从小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再也没有什么环境更能唤起我对于文学的向往了。尽管几经腥风血雨，中国无数优秀作家的名字在当时已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然而，文学却依旧在我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地展现着自己的力量。于是，初中时代那些作家的名字一个个跃入我的脑海，我将来要当一名火车司机，更要当一名工人作家，我想到了当时那么多有名气的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想到他们曾因为是工人作家而被邀请到北戴河度假、写作。那一刹那间，头脑里浮现出的应该成名成家的念头，那种荣耀感，将一年多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对北戴河那由衷的情感立刻就得到了回报。正是在北戴河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能带给我家的一线生存希望。

说来可怜，我同几位来这里的同学相比，是真正的穷困潦倒。不仅身无分文，父亲还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被冤假错案搞趴下了，只能靠推带车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而这类工作，不属于国家正式工人的编制，在武斗期间工厂停工停产，自然带车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全家八口人，竟然无一文钱可用，借遍了亲戚朋友，最后只有变卖家里的财产。就在去北戴河的前几天，妈妈忍痛将家里的唯一像样的财